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2.011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测算及影响机制研究^①

曾小明,刘友金,尹延钊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关键词:中国;一带一路;产业转移;规模测算;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068-08

一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规模的测度

(一) 国际产业转移的测度方法

测算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是实证研究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影响机制的基础。由于使用FDI测度国际产业转移的传统方法无法识别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业转移情况,因此本文借鉴刘红光等人利用最终需求测算产业转移的思想^①,基于王直等^②和 Borin & Mancini 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③,将王恕立和吴永亮测算单向产业转移的方法扩展到双边产业转移^④,从而能够测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长期来看,需求变化导致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分工形成和国际贸易的发生,因此国际贸易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产业转

移。然而由于中间品贸易的存在,在实际中要明确区分一个国家(地区)对另一个国家(地区)的实际需求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庆幸的是,近年来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本文定量测度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框架,可以把一国的总出口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返回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中间品贸易等4个组成部分。其中,本国总出口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可以看作是国外对本国的真实需求,即为国外对本国的产业转移。本国向国外产业转移也遵循类似的逻辑。在双边贸易层面,被进口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最终产品出口被进口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被进口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①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46)

作者简介:曾小明(1986-),男,湖南邵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政策评估研究。

通讯作者:刘友金(1963-),男,湖南浏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产业集群、产业转移、技术创新、区域经济研究。

①刘红光,刘卫东,刘志高:《区域间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研究——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6期。

②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③Borin A, Mancini M. “Follow the value-added: tracking bilateral relatio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MPRA Working Paper, 2017.

④单向产业转移只能给出一个国家(地区)是处于产业转出还是产业转入状态,无法给出产业具体是由哪一个国家(地区)转入或产业具体转出至哪一个国家(地区)。

如果使用 V_t^{rs} 表示 r 国吸收的 s 国的增加值,那么在时间 t 和 $t+1$, r 国吸收 s 国的增加值分别表示为 V_t^{rs} 和 V_{t+1}^{rs} ,如果用 T_t^{rs} 表示 r 国向 s 国的产业转移,那么有:

$$T_t^{rs} = V_t^{rs}, T_{t+1}^{rs} = V_{t+1}^{rs}$$

T_{rs}^t 和 T_{rs}^{t+1} 分别表示截至 t 期和 $t+1$ 期 r 国向 s 国产业转移总量。在时间区间 $[t, t+1]$, r 国向 s 国产业转移量可以表示为:

$$T_{[t,t+1]}^{rs} = T_{t+1}^{rs} - T_t^{rs} = V_{t+1}^{rs} - V_t^{rs}$$

(二)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测度结果

根据前文介绍的方法,本文以制造业为样本,利用来自 OECD 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向“一带一路”27 个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①。图 1 展示了截至 2011 年中国向“一带一路”各国产业转移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产业转移至韩国的总量最大,占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 27 个

国家转移总量的 40%。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是中国产业转出的主要对象国,中国向该 5 个国家的产业转移所占比重达到 40%。中国向菲律宾、印度、沙特阿拉伯、新西兰和越南 5 国的产业转移占比约为 15%,而其他 16 个国家只占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 27 个国家产业转移总量的 5%左右。

分行业来看(图 2 所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化学和化学产品制造业是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最多的行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34%和 14%,该两个行业的产业转移总量占全部产业转移总量的 48%左右。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基本金属制品业、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的产业转移总量占全部产业转移总量的 45%左右,而其他 6 个行业只占全部产业转移总量的 6%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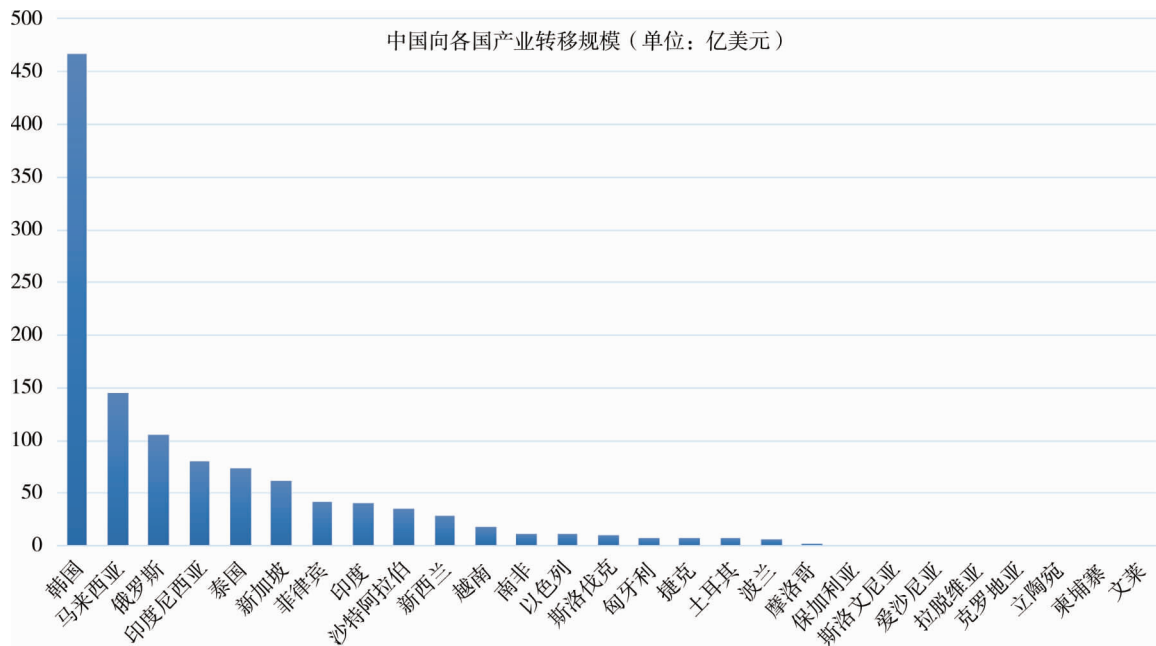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分国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绘制与整理(下同)

为了判别制造业细分行业向各个国家产业转移的情况,我们考察了截至 2011 年制造业细分行业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总量居前三位的国家(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发现,7 个行业

向韩国转移的规模最大,3 个行业向马来西亚转移的规模最大,3 个行业向俄罗斯转移的规模最大,1 个行业向印度转移的规模最大,1 个行业向新加坡转移的规模最大。

^①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列出了 71 个“一带一路”国家。截至本文投稿时间,OECD 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最新年份为 2011 年,其中包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 28 个(包括中国),因此中国产业转移对象国共有 27 个,分别为:保加利亚、文莱、捷克、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以色列、柬埔寨、韩国、立陶宛、拉脱维亚、摩洛哥、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泰国、土耳其、越南、南非。

为了进一步观察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产业转移情况,本文参考黄先海的分类方法^①,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C3、C4、C5)、资本密集型产业(C6、C7、C9、C10、C11、C12)以及技术密集型(C8、C13、C14、C15、C16、C17)三大类,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向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新西兰、俄罗斯、泰国、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向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国家转移,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向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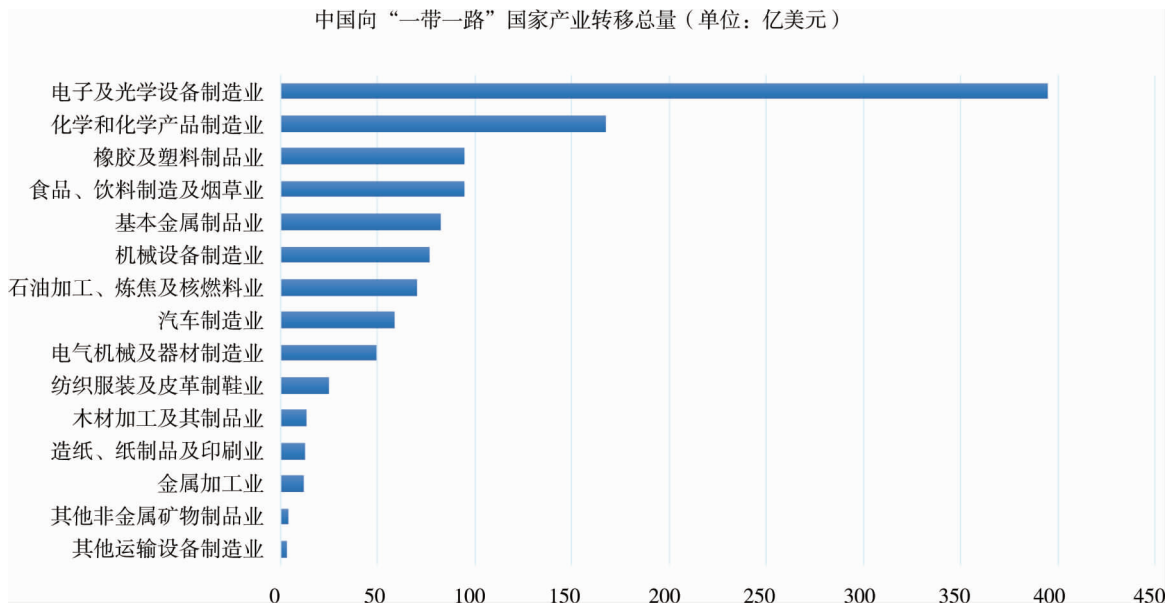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分行业)

表1 制造业分行业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总量居前三位的国家(金额) 单位:亿美元

代码	行业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规模前三位的国家		
C3	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业	马来西亚(25.26)	印度尼西亚(21.85)	新西兰(12.75)
C4	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鞋业	韩国(9.27)	印度(3.22)	泰国(2.57)
C5	木材加工及其制品业	俄罗斯(5.67)	泰国(2.97)	印度尼西亚(1.88)
C6	造纸、纸制品及印刷业	印度尼西亚(4.25)	俄罗斯(2.94)	韩国(1.66)
C7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业	俄罗斯(28.35)	韩国(19.55)	马来西亚(8.96)
C8	化学和化学产品制造业	韩国(56.99)	沙特阿拉伯(29.28)	泰国(17.27)
C9	橡胶及塑料制品业	马来西亚(25.26)	印度尼西亚(21.85)	新西兰(12.75)
C10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马来西亚(1.42)	韩国(1.00)	泰国(0.36)
C11	基本金属制品业	俄罗斯(33.82)	韩国(21.25)	印度(7.52)
C12	金属加工业	韩国(7.04)	印度(1.01)	俄罗斯(0.62)
C13	机械设备制造业	韩国(49.05)	新加坡(7.53)	俄罗斯(3.79)
C14	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	韩国(225.56)	马来西亚(58.35)	新加坡(31.32)
C1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韩国(23.84)	泰国(5.45)	马来西亚(4.32)
C16	汽车制造业	韩国(41.52)	斯洛伐克(8.08)	匈牙利(3.90)
C17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新加坡(1.30)	韩国(0.56)	马来西亚(0.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转移规模大。截至2011年,中国向“一带一

路”沿线27个国家产业转移约1163亿美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产业转移规模较大。第二,国别差异和行业差异大。中国向韩国、马来

^①黄先海:《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5期。

西亚的产业转移比重分别达到 40%、12%,而有 16 个国家的产业转移比重均不足 1%。化学和化学产品制造业、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所占产业转移比重分别为 34%和 14%,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其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所占产业转移比重

均不足 1%。第三,产业类型多。产业转移中既有劳动密集型,如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业、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鞋业,也有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化学和化学产品制造业、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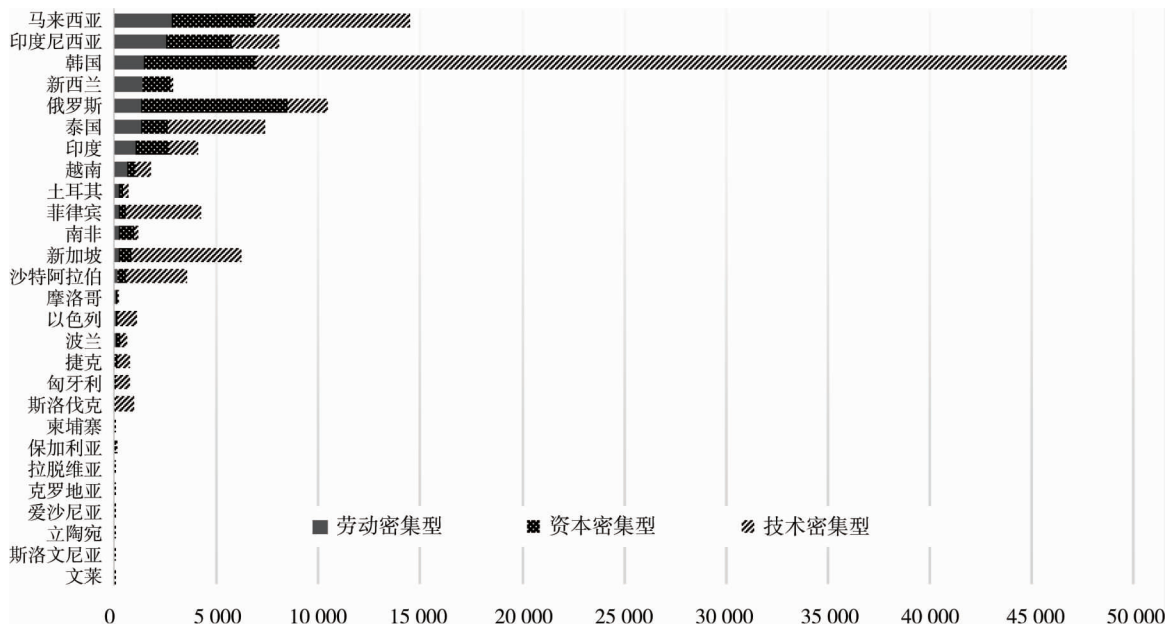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情况(单位:亿美元)

二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

(一) 产业转移影响机制检验模型

本文重点研究“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以及经济环境差异如何影响我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根据国际产业转移经典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参考现有实证研究文献的做法^{①②},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 = \alpha_0 + \alpha_1 X_1 + \alpha_2 X_2 + \varepsilon$$

其中, Y 表示产业转移量, X_1 表示产业价值链因素向量, X_2 表示其它影响产业转移的政治、经济、法律、自然资源等因素向量。 α_0 表示常数项, α_1 、 α_2 表示变量系数, ε 表示误差项。

假定地理要素是区位条件以及其他短期内不变的要素,对两个时期的产业转移量进行差分,可以消除这些不可测度的地理因素,但为了观察距离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依然保留距离变量,因此得到产业转移的计量模型。

$$\Delta Y = \alpha_1 \Delta X_1 + \alpha_2 \Delta X_2 + \alpha_3 d + e$$

ΔY 表示产业转移变化量,通过比较截至 2005 年与 2011 年制造业细分业转移总量的变化,用来表示该时间段内的产业转移。 ΔX_1 表示价值链地位变化向量, ΔX_2 表示其他影响产业转移的经济环境因素变化向量, d 表示距离变量。

(1)关于产业价值链地位变化的指标,这里主要关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雁阵模式及产业梯度转移等经典产业转移理论的一个共识就是,产业一般会从价值链地位较高的经济体梯度转移到价值链地位较低的经济体。本文基于 Koopman et al.的方法测算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③,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与产业转移对象国的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用 $RGVC_{ij}$ 表示。

$$RGVC_{ij} = GVC_{cj} - GVC_{ij}$$

其中, i, j 和 c 分别代表“一带一路”国家、行业和中国。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表示中国相对产

①胡安俊,孙久文:《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机制、次序与空间模式》,《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4期。

②谢孟军,汪同三,崔日明:《中国的文化输出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孔子学院发展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4期。

③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et al.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0, No. w16426.

业转出对象国*i*在*j*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差额,值越大表明中国*j*行业相对产业转出对象国*i*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经合组织发布的“OECD-WTO TiVA 数据库”中的增加值贸易数据。

(2)其它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包括:1)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东道国的人均GDP表示。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产业多样性越强,基础设施及物流等条件较为优越,市场需求潜力也较大,将有助于吸引产业转移。2)东道国劳动力规模,用东道国的劳动力总人数表示。劳动力数量是影响产业转移特别是低技术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吸引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①,在控制东道国人均GDP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越多代表东道国劳动力成本越低。3)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用东道国的航空运输量(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作为代理变量,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4)东道国研发强度,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影响,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越有利于吸引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5)工业配套能力。一定的工业配套能力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提,本文用东道国的工业化率作为工业配套能力的代理变量。6)东道国的资源禀赋。资源密集型产业对东道国的资源禀赋较为关心,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用东道国矿石及金属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表示,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7)政局稳定性。东道国政局稳定性、执政党的执政时间、公众的话

语权等也可能对产业转移产生影响,政局越稳定越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8)法制健全度。法制越健全的国家,一方面可以在产业转移后遇到利益冲突或纠纷后比较容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法制健全的国家已经过了产业承接阶段,对我国的产业转移造成负影响。9)政府效率。政府效率的提升可能更有利于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除了资源禀赋变量,其余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地理距离变量。引力模型认为地理距离也会对国际产业转移产生影响,地理距离越近越有利于产业转移,地理距离通常与产业转移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地理距离指数主要来自于CEPII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用四种不同方法测量的双边距离,涵盖200多个国家,本文采用的是根据主要人口聚集地距离及其所占总人口比重加权计算所得的测量值。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2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产业转移规模对数的最大值为9.43,而最小值为负数,标准差约为3,说明产业转移规模在产业间和国家间的差异比较大,这与前文测算的结果是一致的。其余变量也呈现出与此类似的特征,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地理距离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劳动力规模差异性相对比较大。从可以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最小值来看,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小值为正,其他变量的最小值均为负,说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2005~2011年间没有出现下降,但其它变量均在某些国家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2 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符号	类型	变量名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Y</i>	ΔY	产业转移规模	405	2.168 3	2.962 5	-4.605 2	9.430 9
<i>RGVC</i>	ΔX_1	相对GVC地位	405	0.074 0	0.108 2	-0.346 4	0.351 6
<i>DIS</i>	<i>d</i>	地理距离	405	6.099 6	2.675 1	0.999 2	11.820
<i>PGDP</i>	ΔX_2	经济发展水平	405	8.007 6	0.908 8	5.741 3	9.723 2
<i>Labor</i>	ΔX_2	劳动力规模	405	1.876 4	2.793 9	-0.117 7	11.573
<i>Traffic</i>	ΔX_2	基础设施	405	7.450 8	10.067	-1.381 9	36.514
<i>RD</i>	ΔX_2	研发强度	405	0.269 0	0.411 8	-0.127 4	1.382 9
<i>IM</i>	ΔX_2	工业化率	405	-1.277 1	2.323 4	-6.175 4	2.112 6
<i>ZY</i>	ΔX_2	资源禀赋	405	0.414 8	2.759 5	-8.800 0	8.600 0
<i>LP</i>	ΔX_2	法制健全度	405	0.059 5	0.189 7	-0.297 4	0.576 6
<i>GE</i>	ΔX_2	政府效率	405	0.056 6	0.138 9	-0.231 9	0.307 6
<i>PS</i>	ΔX_2	政局稳定性	405	-0.007 8	0.294 0	-0.488 6	0.719 6

注:对*Y*和*PGDP*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①戴翔,刘梦,任志成:《劳动力演化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发展:转移还是转型》,《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

为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考察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3)。可以发现,不管是 pearson 相关系数还是 spearman 相关系数,只有个别的相关系数超过了 0.5,绝大

部分的相关系数在 0.5 以下。根据相关系数矩阵的判断方法,本文回归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 3 变量的相关系数

	<i>RGVC</i>	<i>DIS</i>	<i>PGDP</i>	<i>Labor</i>	<i>Traffic</i>	<i>RD</i>	<i>IM</i>	<i>ZY</i>	<i>LP</i>	<i>GE</i>	<i>PS</i>
<i>RGVC</i>	1.00	0.14***	-0.30***	-0.10*	0.54***	0.44***	0.03	-0.17***	-0.33***	-0.24***	0.02
<i>DIS</i>	0.12**	1.00	-0.10*	0.00	0.06	0.05	-0.00	0.15***	-0.07	-0.07	0.05
<i>PGDP</i>	-0.33***	-0.10**	1.00	0.19***	-0.52***	-0.50***	0.03	0.26***	0.26***	0.17***	-0.27***
<i>Labor</i>	-0.06	0.06	0.24***	1.00	-0.43***	-0.45***	0.08	0.03	0.04	0.42***	0.26***
<i>Traffic</i>	0.40***	0.02	-0.47***	-0.50***	1.00	0.79***	-0.07	-0.12**	-0.38***	-0.45***	0.16***
<i>RD</i>	0.41***	0.07	-0.44***	-0.32***	0.81***	1.00	-0.07	-0.16***	-0.38***	-0.57***	0.13***
<i>IM</i>	0.01	-0.16***	0.02	0.20***	-0.17***	-0.11**	1.00	0.13***	-0.16***	0.10*	-0.36***
<i>ZY</i>	-0.23***	0.10**	0.37***	0.09*	-0.20***	-0.14***	-0.00	1.00	0.18***	0.14***	-0.00
<i>LP</i>	-0.29***	-0.03	0.34***	-0.06	-0.23***	-0.32***	-0.38***	0.37***	1.00	0.01	0.07
<i>GE</i>	-0.30***	0.03	0.17***	0.41***	-0.31***	-0.50***	0.15***	0.34***	-0.00	1.00	0.35***
<i>PS</i>	-0.02	0.05	-0.24***	0.18***	0.21***	0.17***	-0.15***	0.04	0.14***	0.42***	1.00

注:左下方、右上角分别报告的是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关系数。***、**、*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汇报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关联性来看,相对价值链地位(*RGVC*)、地理距离(*DIS*)的系数和显著性在依次引入各个控制变量之后始终都是稳健的,说明产业的相对价值链地位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地理距离对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影响。相对价值链地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即相对于“一带一路”国家,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幅度越大,中国产业转移的规模也越大。地理距离的估计系数为负,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理距离也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地理距离越近越有利于产业转移,地理距离越远越不利于产业转移。因此,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拉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距离,降低运输成本,对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从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法律、自然资源等因素来看,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产业的承载能力和市场规模通常越大,从而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劳动力规模(*Labo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资源越充裕的国家越利于促进产业转入。从劳动力数量演

化与工业发展关系的现有研究看,结论基本表明,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数量对一国承接产业转移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研发投入(*RD*)的系数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国家的研发强度的增加有利于吸引中国的产业转移,也说明了伴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等级的提高,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加速凸显。政局稳定性(*PS*)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稳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吸引中国的产业转移。在没有考虑制度因素的情况下,工业化率(*IM*)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为负,在考虑了制度因素后,工业化率对产业转移有不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工业化率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资源禀赋(*ZY*)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因为自然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就可以轻易得到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而减少了本国对投资的依赖,并且自然资源开采和简单加工等部门与其它制造业部门巨大的利润差异会导致生产要素从制造业部门向初级部门转移,降低社会投资收益率,进而降低投资水平。法制健全度(*LP*)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法制健全的国家大多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并没有进一步承接我国的产业转移。政府效率(*GE*)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东道国政府效率并不是影响中国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

表4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

因变量: Y	(1)	(2)	(3)	(4)	(5)	(6)	(7)
<i>RGVC</i>	2.9015** (1.3206)	2.8824** (1.3306)	2.7079** (1.3474)	2.4416* (1.3767)	2.7074** (1.3724)	3.0183** (1.2979)	3.0759** (1.2887)
<i>DIS</i>	-0.3563*** (0.0523)	-0.3692*** (0.0625)	-0.1939*** (0.0641)	-0.1774*** (0.0642)	-0.1686*** (0.0640)	-0.0928 (0.0602)	-0.2096*** (0.0532)
<i>PGDP</i>		0.1284 (0.1837)	0.7071*** (0.1949)	0.6544*** (0.1931)	0.6202*** (0.1914)	0.5592*** (0.1829)	0.8438*** (0.2003)
<i>Labor</i>			0.4285*** (0.0622)	0.2857*** (0.0532)	0.2998*** (0.0551)	0.2725*** (0.0546)	0.2299** (0.0927)
<i>Traffic</i>				0.0486*** (0.0162)	0.0474*** (0.0160)	0.0467** (0.0187)	-0.0076 (0.0285)
<i>RD</i>					0.4621** (0.2305)	0.1888 (0.2976)	0.6097** (0.2850)
<i>IM</i>						-0.1478*** (0.0428)	0.0660 (0.0612)
<i>ZY</i>						-0.1001** (0.0487)	-0.2813*** (0.0562)
<i>LP</i>							-8.4520*** (1.6684)
<i>GE</i>							0.6781 (1.4484)
<i>PS</i>							3.6132*** (0.3866)
<i>Constant</i>	4.1455*** (0.3239)	3.1998** (1.2681)	-3.3385** (1.4387)	-3.1023** (1.4203)	-3.0446** (1.4232)	-3.0693** (1.4160)	-3.4922** (1.5054)
<i>Adj.R²</i>	0.111	0.110	0.210	0.218	0.219	0.238	0.340

注:所有回归均聚类在行业层面,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三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策略

(一) 根据产业价值链梯度引导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价值链梯度关系是中国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中国产业价值链相对地位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因此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不仅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的重要路径。首先,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攀升。通过创新驱动掌握核心技术是占领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必由之路,因此要改变过去那种以低成本竞争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格局,就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致力于开发与掌握产业链中高端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断强化和巩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将产业的中低端环节转移出去^①。其次,要改变传统以出口规模、出口市场份额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培育并形成以加快产业升级为导向的新型发展模式,同时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布局,利用区

域合作的价值链或者生产网络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

(二) 通过互联互通拉近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距离

地理距离对产业转移具有负向影响,应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拉近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和合作共生。促进互联互通既包括加强以基础设施为基础的硬件建设,又包括抓好制度和规划衔接融通为基础的软件建设,还包括便利各国之间人员跨境的往来与交流,最终形成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连通。其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推进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基础性支撑,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沿线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抓好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制度规章的互联互通是推进中国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重要保障,积极推动中

^①李敦瑞:《国内外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影响及对策》,《经济纵横》2018年第1期。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合作规划,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政治互信,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建立有效的制度规章协调机制。人员交流是推进中国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重要桥梁,应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人员的跨境往来与交流,增进国家间的了解、文化沟通和学术交流,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增进信任和友谊,为产业转移提供信任基础。

(三) 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增强其内生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然而,“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大多数国家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产业承载能力不强。因此,中国需要发挥战略先导作用,通过设立丝路基金以及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援助资金,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同时启动需求、创造就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造血”功能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使中国产能走出去,实现了产业转移。实质上,中国给予沿线国家的机会援助和发展援助,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方式。当前,中国援外应当全力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援助

范围以及援助资金上,不仅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而且要向那些与产业承接相关且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项目倾斜。这一方面要求中国与亚投行之间进行战略分工,提高融资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提高其产业承接能力和发展能力。

(四) 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稳定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吸引中国的产业转移,因此在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科学评估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①,防止产业转移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转移应该是战略性、长期性的互惠共赢发展方式,有赖于沿线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对华关系的稳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利于中国的产业转移,因此在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避免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中,防止自然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带来的“资源诅咒”风险。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有必要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风险进行识别与防范,确保产业转移的合理有序。

On the Scal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ZENG Xiao-ming, LIU You-jin & YIN Yan-zhao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resource shar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presents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i.e. large scale of transfer, lots of countries and industry differences, and multiple industry types. Both China's industrial value chain statu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labor force scale,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leve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while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resource endowment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it.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 shall, on the one hand, enhance the status of China's global value chain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On the other hand, we shall scientifically identify and guard against the political risks as well as the risks of “resource curse”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Key words: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industry transfer; scale measurement; impact mechanism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邢钢:《“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PPP 项目提前终止法律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18 年第 2 期。